

朝鲜战争与东北亚格局

夏季亭¹ 齐廉允¹

(1. 山东英才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4)

摘要:东北亚的钥匙是朝鲜半岛,谁掌握了朝鲜半岛,谁就掌握了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局势每一次大的变化,无不影响到东北亚格局的变迁,而东北亚格局的演变,也必然左右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结束正是这种相互关系的最好诠释。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朝鲜战争是东北亚格局演变的结果,而战争的爆发与结束又促进了东北亚格局的重建。

关键词:朝鲜战争;两大集团;东北亚;格局;对抗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0)10-0034-09

今年是朝鲜战争(也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朝鲜战争与东北亚格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是对历史辩证法的有益阐释,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但已有研究成果多是就战争爆发之前的东北亚格局展开论述,或较多地讨论战争对东北亚格局的影响,对历史事件的整体认识与动态把握尚显不足。^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从宏观上、用动态的视角探讨朝鲜战争与东北亚格局的互动关系。

一、朝鲜战争爆发前两大集团对抗格局的初显

伴随着“二战”的结束,东北亚格局也由中美苏与日本的对抗转变为美苏的对抗,不过这种“两强”对抗格局随着冷战局势的加强很快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为应对世界新形势,各国都在积极调整地区战略,由此,东北亚格局愈益扑朔迷离。不过,新格局的建构于千般变化中呈现出一个明显趋势,即美日韩与中苏朝“双边

收稿日期:2010-06-26;修订日期:2010-10-20。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抗美援朝战争:地位与影响”成果之一(05BFZ20)。

作者简介:夏季亭(1960—),男,山东德州人,山东英才学院院长,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史;齐廉允(1976—),男,山东荷泽人,山东英才学院世界历史与文化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

①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李锐:“朝鲜战争对于两大阵营格局的影响”,《韩国学论文集》(第14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112页;李春虎:“朝鲜战争后的东北亚局势与民主朝鲜的抉择”,《韩国研究论丛》(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9-108页;金正浩:“朝鲜战争与东北亚格局”,《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美]约翰·托兰著,孟庆龙等译:《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东福著:《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峰君、王传剑著:《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小明著:《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Tsou 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赵学功著:《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

六方”的对抗格局在东北亚开始崭露头角。

1.1 美日韩三方渐行渐近

“二战”后的初期,美国对日本规定了严格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目标。不过,从1948年起,美国的对日政策开始由削弱转为扶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0月7日通过的NSC13/2号文件指出:“扶植日本经济复兴应该成为将来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①1949年12月制定的NSC48/1和NSC48/2号文件认为:在亚洲,美国必须“保持便于控制亚洲沿海和海外交通线的战略地位”,而战略防守的第一道防线“应包括日本、琉球群岛与菲律宾”。如此一来,日本就被摆在了美国东北亚“遏制”战略的前沿阵地上,美日同盟关系迈出了一大步。自然,美日关系日渐亲密,与日本自身的努力争取也不无关系。

与对日本战略地位的快速确认不同,美国决策层对韩国战略地位的论证却耗费了较长时间。1948年4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个对朝鲜政策决定(NSC8)认为:“朝鲜的任何党派、任何势力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只要不构成对美国宣战的理由,美军就不应该过度介入。”^②1949年6月29日,除了一个约500人的军事顾问团外,驻韩美军完成撤离,这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完成了以收缩为特征的战略调整。不过,从半岛“脱离”虽是朝鲜战争前美国对韩政策的目标,但并非全部。作为撤军的补偿性措施,援助仍是美国对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美国调整对韩政策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很快全面介入其中。

从“二战”之后至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美日韩三国都在调整对外政策,逐渐接近,这种接近不仅为后来三国在战争期间一致行动提供了基础,也塑造了东北亚对抗格局中重要一极的雏形。

1.2 苏中朝三国结盟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国同盟关系确立。该条约的签订意味着1945年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

同盟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将在1952年不复存在。为了保持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控制朝鲜半岛无疑是维持苏联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基于此,苏联开始大规模援助朝鲜。“1950年苏联对北朝鲜军事援助总计约8.7亿卢布,即使按战争爆发前半年计算,也远远高出1949年全年的援助总额。”^③在提供物资帮助的同时,斯大林还直接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策划。在金日成3月30日对苏联的访问中,斯大林认可了北朝鲜拟定的统一方案。其后,金日成又寻求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于5月14日分别对金日成和苏联大使罗申表示“支持以速战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坚信其胜利”。^④至此,金日成武力统一的计划获得了苏中的赞成或默许,在迎接战争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过,在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中国更无意介入其中,但半岛局势的发展很快把中国拖进战争之中。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战局的恶化迫使金日成向苏联、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在接到金日成的求援信后,毛泽东又收到斯大林鼓动和要求中国介入战争的电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0月19日渡过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仗。中国全面介入战争,苏中朝三国事实同盟关系初步形成。

1.3 美国对日媾和策略与中苏同盟条约的互动

“二战”后不久,美国在对日媾和上是坚持

^① 仇朝兵:“1947—1948年对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② FRUS, 1948,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Vol. VI, Korea, pp. 1163—1169.

^③ 沈志华著:《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18—119页。

^④ 《罗申关于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情况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5月14日),转引自金东吉:“‘三国同谋论’分析:朝鲜战争起源的再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盟国合作、全面媾和的。^①但1948年后,美国对日媾和开始脱离与远东委员会成员国、特别是苏联协调的轨道,转向单独媾和;对日媾和的性质,也从结束战争的手段蜕变为反对亚洲革命的手段。苏联不赞同美国的媾和方案,在1949年5月23日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上提出关于确定召开有中国参加的讨论对日和约条款会议日期的建议,但美国对此毫不理睬。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和苏联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使苏美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转化,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愈显重要。因此从1949年秋开始,美国确立了在苏联不同意的情况下单独媾和的方针。^②

形势的发展促使中苏逐渐走到一起,在共同利益诉求的推动下,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同盟把正在形成中的美日同盟视为未来的对手,条约特别提到双方保证要“经过彼此同意”,“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中国以苏联盟国的角色加入冷战,导致了美国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转向。就在中苏同盟条约公布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外交发言人宣布:“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而无须俄国参加。”1950年5月18日杜勒斯提出,为了保证亚洲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当务之急就是让日本独立。受此影响,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5月31日关于东亚新政策的报告中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证明美国现在必须修改原来的东亚政策,加速对日媾和。^③

麦克阿瑟6月23日的备忘录反映了美国政府内部就对日媾和达成的协议内容: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为防卫作战之需要,整个日本领域作为潜在的基地,给予美国无限制行使防卫权力的自由。在签订和约的同时,日美缔结安全协定,日本给美国以驻军及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④加之,日本吉田政府反复表示在和约签订后日本仍将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日本政府1950年6月1日发表的白皮书宣称愿意同任何承认其独立的国家签订和约。^⑤如此等等,都催生了美国对日媾和决策的出笼。

恰如沈志华先生所论:“在朝鲜战争爆发之

前,由于受到中苏同盟条约的刺激,华盛顿决策层已经消除了在台湾问题和日本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尽管尚未形成决策,但美国对台政策及对日媾和方针的前景已经明朗化,所需要的只是实现这些新构想的机会和条件。”^⑥在这里,沈先生强调中苏同盟条约对美日媾和决策的刺激作用,但反过来而言,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何尝不是美日接近促成的结果呢?正是对美日威胁的忧虑才促使中苏接近并成功缔结同盟条约。因此,美日媾和决策的形成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是一个互动过程,二者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共同构筑了朝鲜战争爆发前东北亚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在东北亚地区就隐约出现了两大对立集团的雏形,并在某些问题上展开了角逐。随着两大阵营对峙雏形的渐趋呈现,东北亚局势也日渐紧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朝鲜战争恰是两大集团在东北亚对抗发展的结果。

二、朝鲜战争期间两大集团对抗格局的正式形成

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拉住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纠集在一起,构筑了共同防御体系。两大集团不仅在战场上血战,还在经济、外交等领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不仅加重了集团之间的对抗与仇视,还为集团内部

^① 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形成史论”,《美国研究》,1992年第2期。

^② [日]渡边昭夫著:《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东京有斐阁1985年版,第41页。

^③ FRUS, 1950,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Vol. I,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p. 347–349.

^④ FRUS, 1950, *Far East and Pacific*, Vol. VI, Japan, pp. 1227–1228.

^⑤ Schaller Michael,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57–259.

^⑥ 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关系的强化提供了条件。这种全方位对抗的存在标志着东北亚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正式形成。

2.1 两大集团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对抗

朝鲜战争首先在半岛南北之间展开,随着美、中等国参战,战争也由国内民族解放战争转变为具有国际意义的战争,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转变为中美之间的战争。中美双方派往朝鲜战场的兵力高达300多万。中国先后抽调27个野战军轮流到朝鲜战场,在朝鲜前线及后方的中国兵力高达百万以上。美国把自己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到朝鲜战场,运用了除原子技术之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

苏联事实上也参加了朝鲜战争,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所需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绝大部分由苏联提供。除了留在朝鲜军队中的苏联顾问参加了战争的策划和指挥外,苏联空军还直接参加了战争,并在空战中成为中朝方面的主力军,为中朝军队的地面战斗、后勤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①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积极充当美国盟友,为配合美军登陆,日本组织了扫雷队直接参战。不过,日本更多的是为美军充当前进基地和后方补给场所。据估计,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后勤总部如果不用日本人,而由美国人发挥全部的补给和服务功能,就须增兵20万至25万人。^②

2.2 两大集团的经济战:禁运与反禁运

两大集团不仅在战场上展开军事对抗,还在经济领域展开禁运与反禁运斗争。经济领域的对抗不仅是两大集团对抗的体现,又使对抗进一步激化。

1948年3月1日,美国政府禁止向苏联、东欧国家出口美国贸易管制清单内的各种物资。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于1950年6月25日通过决议,禁止成员国对朝鲜提供帮助。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

美国的对华贸易管制始于1949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定扩大对华1B产品贸易出口

的控制范围,把对苏联、东欧国家施行的更严厉的贸易控制原则施于中国,尤其是扩大到石油和石油产品系列。^③ 1950年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30日,又下令停止签发运往中国的1B类产品许可证;12月初,美国商务部宣布自12月3日起对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出口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此前只对战略物资实行许可证管理),从而对中国实行了实际上的全面禁运。美国还极力促使其他国家共同参加对华禁运。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大通过决议,建议每一个国家对华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共同防御援助控制法案》,以停止美援相威胁,迫使其他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禁运300余种战略物资。

日本的对华禁运是美国对华禁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盟军总部完全停止批准日本对华出口1B类产品,仅允许已签订合同的1B类产品继续出口。1952年9月,美日签署了《日美关于对共产党中国实行出口控制的谅解书》,根据这一文件,日本不仅要对列入国际禁运货单的物资以及没有列入国际货单但列入美国禁运货单的物资实行禁运,而且要对两国都同意的其他物资实行禁运。这就是说,日本对华禁运远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厉。

面对西方国家的禁运与封锁,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的反禁运措施:(1)中国政府决定对资本主义国家改用“先进后出”方式为主的易货贸易,同时清查和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

^①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338页。

^② D. Clayton James, *The Year of MacArthur*, Vol. III,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5, p. 329.

^③ 1948年3月,美国商业部在对外贸易方面把所有国家分成两类:R类包括东西欧所有国家及苏联;O类是其他国家。对R类国家的任何出口都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称为R程序。在R程序中又把战略物资分成两类:一类是军火装备及与战争潜力直接有关的物资,称1A;另一类是战略重要性稍次的物资,称1B,如钢铁、机车、机车部件、商船、载重10吨以上的火车车厢等。

切美国公私财产,冻结一切美国公私存款。^① (2)重点发展与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1950年,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2.4%,1951年增加到52.9%,1952年达到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另一方面,中国也供应了苏联等国需要的战略原料和其他重要物资,如稀有矿产品、稀有金属、大豆、植物油等。^② (3)通过改变贸易办法、调动私商的积极性、改变进口渠道等多种方式建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促进贸易关系的正常化。^③

2.3 中苏联合对抗美国主导的对日媾和

朝鲜战争的爆发推动美国加快对日媾和的步伐。杜勒斯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并强调早日媾和与重新武装日本的不可分割性。^④ 1950年9月14日,杜鲁门正式授权国务院就对日媾和问题与有关国家会谈。10月26日,杜勒斯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递交了被称为“对日媾和七原则”的备忘录。收到文件后,马立克也向杜勒斯提交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提到苏联政府愿意知道,美国“作何措施以确定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⑤ 12月4日,周恩来就美国和苏联的两份备忘录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声明谴责美国不愿从日本撤军,“并且利用日本作为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基地”,以及公开武装日本和企图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⑥

1951年3月30日,美国又向苏联提交了一份含有秘密备忘录及有关对日和约草案的照会,强调不参加本条约的国家将不给予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和利益。关于领土问题,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规定,只提日本放弃这些领土,但未提其归属。尽管对《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给予苏联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仍采取承认的立场,但条件是“这一规定只有在苏联签订和批准条约的情况下才会生

效”。^⑦

5月6日,罗申向中国方面转交了斯大林致毛泽东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密电,表明了苏联的立场。毛泽东回电表示“完全同意”斯大林“对美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⑧ 5月7日,同中国协商过的“苏联政府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由苏联外交部转交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柯克。“意见书”详细阐述了苏联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观点,批评了美国的和约草案。5月22日,周恩来正式向罗申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及其关于准备对日和约的具体建议”^⑨。6月10日,苏联再次照会美国,指责美国和约草案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美国对此置若罔闻。7月20日,美英两国向苏联外交部递交联合照会,其中包括一封请苏联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信。照会虽建议苏联对和约草案提出意见,但同时又声称,不管有何意见,最终文本都将在8月13日公布。反复考虑后,联共(布)中央通过了苏联出席旧金山和会的决议。8月12日,苏联外交部指示罗申把苏联参加和会的决定通告中国政府,同时保证将在和会上提出邀请中国代表与会的问题,并强调没有中国的参加不能缔结对日和约。^⑩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352、358—359页。

^② 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③ 陶文钊:“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④ FRUS, 1950, *Far East and Pacific*, Vol. VI, Japan, pp. 1243, 1247—1248.

^⑤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58—60页。

^⑥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58—61页。

^⑦ FRU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VI, Japan, p. 908,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80—86页。

^⑧ 沈志华著:《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757页。

^⑨ 同⑤,第87—93页。

^⑩ 张盛发:“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美国主导的对日媾和”,《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旧金山会议开幕时,美国操纵多数否决了苏联代表团关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和约的提案。遭到拒绝后,苏联又提出修改和约草案的建议,美国同样不予讨论。在此情况下,苏联等国拒绝在对日和约上签字。中国似乎早已预见到和会的结果,差不多与旧金山签约仪式同时,中国外交部把拒绝承认和约的声明文本交给了苏联大使馆,声明重申,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①

由于拒绝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苏联在日本问题上的地位十分尴尬,5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苏联代表团,由于和约生效,代表团已丧失合法地位。6月27日,苏联驻日代表及多数随员不得不离开东京。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屡屡被动的苏联决定反击,在1952年9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0票对1票支持日本要求成为会员国的申请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动用了否决权。中苏还延长了苏军撤出旅顺的期限,在斯大林看来,苏军驻留旅顺“是针对美国的”,因为“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1952年8月20日,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答应给予中国全面的经济、军事援助。

2.4 两大集团内部同盟关系的强化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两大集团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这加重了对抗的程度。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同盟关系,集团内部都在有意识地加强协调与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同盟实力。在当时非此及彼的东北亚格局中,同盟内部关系的强化也就意味着两大敌对集团对峙的加强。

美国加大对韩国的援助力。从1950年至1953年,美国共向韩国提供5.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来进行民事救济、维持生计、保持稳定。除了经济援助外,美国还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借助美国的援助,到1952年,韩国军队已基本实现正规化,作战和防御能力大大增强。至1953年,韩国从美国接受的军事援助达70亿美元。^②

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美日同盟的缔结是伴随着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展开的。1951年6月

28日,美日就对日和平条约和美日双边安全协定问题举行磋商,经过近2个月的协商,条约文本正式形成。1951年9月8日,《美日安全条约》正式签订,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日两国同盟关系的确立。之后,美国加快了对日援助步伐,日本很快得以重整军备。至1952年4月底为止,日本警察预备队增加了3.5万,总数已达11万。^③在加速武装日本的同时,美国政府还积极从经济上复兴日本。

苏中同盟关系的巩固。朝鲜战争前,中苏两国虽已建立同盟关系,但还很脆弱,正是在朝鲜战争中,中苏同盟得到了考验,双方加深了信任。正如俄国军事史学家沃尔科格诺夫指出的:“朝鲜冲突加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也加强了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在战争期间,苏联加大了对华援助力度。1950—1953年苏联共向中国贷款7笔,总计协议金额为50.91亿旧卢布,实际使用金额48.1亿旧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7.72亿旧卢布,军事贷款占实际使用金额的99%多。这些军事贷款中,用于抗美援朝的款项约为32亿旧卢布,约占贷款实际使用金额的66%多。^④除了大量贷款之外,苏联还对华提供援建项目、提供技术、派遣专家等多种援助方式。

在朝鲜战争期间,东北亚已正式形成中、苏、朝与美、日、韩两大集团对峙的格局。为了维护己方利益,两大集团都千方百计地打击、限制对方的发展;同时通过同盟内部的调整与协调,强国加大对弱国的扶植与援助,不仅同盟的整体实力得以提升,而且同盟关系也得以巩固,

^① 《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年)》(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2页。

^② [美]E. S. 梅森、[韩]金满堤等:《韩国经济与社会近代化》,韩国开发研究院,1985年版,第201页。

^③ [日]正村公宏:《战后史》(上),东京筑摩书房,1986年版,第315页。

^④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398页。

这也构筑了战后利益边界和敌我阵线严谨分明的东北亚两大集团对抗的冷战格局和政治生态发展的主要趋势。

三、朝鲜战争后两大集团对峙的升格与固化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但两大集团对抗的东北亚格局不仅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结,反而表现出更加强烈而愈益泾渭分明的发展态势。两大阵营一方面强化集团内部的协作、沟通,以增加集团本身的安保系数;另一方面,采用政治、经济、外交等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击、削弱对手。这种针锋相对的对抗态势是朝鲜战争之后东北亚格局最显著的特点。

3.1 两大集团对峙的固化

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东北亚和平时代的到来,对抗仍在继续。战争中血与火的较量不仅刺激了两大集团的敌对与仇视,并造成这种对抗格局长期得不到缓解与改观。

经过战争,在朝鲜半岛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分裂,加深了南北双方的敌视,使短期内和平统一的希望更加渺茫,最终双方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而使以南北敌对为核心的半岛冷战体制固定下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韩朝之间的接触与对话才逐渐密切,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难度相当大,朝鲜半岛的分裂与对峙局面仍会继续下去。

朝美之间的对抗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就已开始。战后两国之间的对抗依然如故,并有强化的趋势。整个20世纪50年代,双方相互敌视,朝鲜认为美国在韩驻军以及联合国对朝鲜事务的干涉阻碍了朝鲜人民依靠自己力量谋求民族统一的进程,甚至指责美国“正在把南朝鲜变成它的一个核基地”^①。直至90年代,两国才进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正式准备阶段。

停战协议签订后,中美军事上的直接对抗虽结束了,但在政治、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疑惧、仇视不仅没有丝毫减弱,反而长期成

为两国关系的主流。美国顽固地拒绝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953年6—7月,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反对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修正案。同时,在联合国大多数国家放松对华贸易禁运及美国缓和对苏联、东欧贸易管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依然不顾每年要付出4000万—7500万美元的经济代价顽固地坚持对中国的贸易禁运政策,出口限制不仅没有丝毫放松。相反,由于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产品又被增补到禁运货单上。^② 在两国对抗的年代,美国国内掀起强烈的反共情绪,麦卡锡主义更将这种情绪推向高潮。在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厌恶情绪也十分强烈,“打倒美帝国主义”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用得最多的口号之一。

朝鲜战争之后,韩国继续推行亲美反共的政策,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韩国政要不时发表一些反华言论,中国对韩国也多是批判与谴责,双方在遣返战俘、政治会议等方面进行了长期的争吵。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韩关系才有了某种松动。但总体而言,冷战时期,中韩彼此敌视,相互隔绝,几乎没有任何往来。

3.2 两大集团正式形成军事对峙,加剧了核竞赛

战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纷纷扩充军备和国防预算,发展核武器,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军事上正式形成对峙的局面,东北亚地区也进入长期对抗、更加动荡的政治氛围之中。

朝鲜半岛的战火刚熄,美国就具体提出研制氢弹、加速军队建设、大幅度提高军备等计划。1950—1970年,美国累计国防开支达11145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5倍多和中英法德日意6国军费开支总和的2倍。^③ 同时,美国频繁进行核试验,大大增加原子弹储存量。

^① [朝]《劳动新闻》,1958年2月6日。

^② NSC5810,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pril 3, 1958," 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7页。

^③ [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埃德·郑德鑫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页。

1959—1961年间,美国平均每天制造的核武器数量达75枚。日本则在朝鲜开战伊始,就在美国同意下宣布成立警察预备队,并在1954年建立了正规的三军自卫队。韩国的军队人数则由战前的10万余迅速增至65.5万,后来一直维持在60万左右,并且拥有F-5战斗机等高性能进攻武器。空军于1955年开始换装喷气战斗机,1957年底实现了战斗机喷气化。

针对美日韩一方强化军备的举动,苏中朝自然不会无动于衷。苏联马上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热核武器研究,并在1953年8月试验成功了第一枚氢弹。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洲际导弹,到60年代后期,苏联已经拥有洲际导弹1200枚,潜艇发射导弹230枚,远程轰炸机150架。^① 在朝鲜,武装力量兵员由战前13.5万达到战后的41万,并在1958年组建了约50万人的民兵队伍。同时,还花费大量资金从中国和苏联购买包括米格-29飞机和SU-25地对空导弹等大批的武器装备。在中国,1950年的军费开支占国家总支出的41.5%,到1951年上升到42.5%,经济建设投资仅占29.5%。从1950年到1970年,中国军费开支累计近2000亿美元,年均约100亿美元,大大超过经济实力比中国雄厚的英、法、德、日、意等国同期军费开支。^②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3.3 集团内部同盟关系的强化、同盟力量的增加

经过朝鲜战争的考验与锤炼,中苏朝三国的同盟关系在战后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紧密合作,协调一致,迎来了同盟关系的“蜜月”期。

政治上紧密合作、趋向和谐。三国领导人多次互访,就朝鲜半岛与国际局势交换看法,在政策、行动上保持协调一致。对于朝鲜的主张与要求,中苏两国基本上给予完全的支持;而中朝则支持苏联的国际战略,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扩张。

经济上互助合作,共同发展。1953年,苏联

政府向朝鲜提供了10亿卢布的援助并提供800台机械设备,中国政府不仅无偿地将自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赠送给朝鲜,还决定在1954—1957年内,再向朝鲜无偿赠送8万亿元人民币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用。^③ 苏中的援助成为支撑朝鲜战后经济恢复的最主要动力。苏联对华提供大量新技术,此举被誉为世界“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中国出口的大量战略物资是苏联发展尖端科学必不可少的原料,48.4%的农副产品出口对苏联有效抵制西方的贸易封锁也提供了极大帮助。^④

外交上一致行动,相互支持。朝鲜战争期间,中苏朝三国就有在外交领域密切配合、共同作战的先例。战后,这种传统得以保留,并发展到新高度。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三国再一次团结合作,这成为同盟关系全面发展有力见证。

朝鲜战争结束了,但美国政府认为,“共产党国家只不过将停战作为削弱和分裂自由世界的手段”^⑤。据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方面加强对日韩的援助,另一方面努力促成“尽早建立包括菲律宾、日本、中华民国、韩国在内的……西太平洋集体防卫体系”^⑥。因此,朝鲜战争之后,美日韩三国的同盟关系也有了新进展。

1953年11月17日,美韩正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这标志着美韩同盟的建立。从此,韩国正式成为美国在东北亚的一个重要盟友。在美国的帮助下,韩国发展获得了宝贵的资金和技术支持。1953—1960年间,美国共向韩国提

^① Richard Smok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126.

^② [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埃德·郑德鑫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页。

^③ 刘金质、杨准时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页。

^④ 沈党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⑤ FRUS, 1952—1954, Korea, Vol. XV, part2, Armistice Attained, pp. 1341—1342.

^⑥ FRUS, 1955—1957, Korea, Vol. XXIII, part2,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pp. 42—48.

供各类经济援助总额约为18.2亿美元。1953—1957年间,韩国将近100%的固定投资均来自美国援助。^①在大量援助中,军事援助占重要地位。从1953—1960年,美国累计向韩国提供各式现代化飞机近170架、军舰约50艘、导弹300多枚、装甲战车近1000辆。

美日同盟关系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54年3月,《日美相互安全保障法协定》正式签字,它要求日本从人力和物力方面增强防卫自己和自由世界的武装力量。与此相适应,日本国会通过了《自卫队法》和《防卫厅设置法》,将保安厅改为防卫厅,日本的重新武装走上正式化轨道。1960年1月19日,美日签署《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新条约更强调美日间的“合作”,并且这种合作的外延十分宽泛,由单纯的安全领域向较为广泛的政治、经济领域延伸。

朝鲜战争之后,由于历史积怨长期敌视的日韩关系开始改善。其实日韩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早在战争期间就开始。不过,整个20世纪50年代,双方虽有多次会谈,但成果甚微,邦交

正常化可谓步履维艰。直至1965年6月22日,两国才正式签署《日韩关系基本条约》等系列文件,实现邦交正常化。至此,美日韩三国相对稳定的同盟关系得以建立。

四、结论

朝鲜战争爆发前,在东北亚已初步呈现出苏中朝与美日韩两大集团对峙的雏形,这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催生剂。战争期间两大阵营不仅在战场上血战,还在经济、外交等众多方面对抗,这标志着双方对峙格局正式形成。战争结束后,两大集团不仅通过种种方式强化盟友关系,增强同盟力量;还在军事领域竞赛、经济领域禁运、外交领域争吵谩骂、思想文化领域歪曲宣传,使两大集团在东北亚的对峙达到顶峰并使对抗格局固定化。这种极端强化的对峙格局又反作用于朝鲜半岛,使半岛局势趋向紧张。

责任编辑 薛迎春

The Korean War and the Pattern of Northeast Asia

XIA Jiting¹, QI Liyan¹

(1. Shandong Yingcai University, Jinan 250104, China)

Abstract: Korean Peninsula is the key to Northeast Asia. The one who masters the Korean Peninsula, also masters Northeast Asia. Each major change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variably results in changes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Asia will also reciprocally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in Korean Peninsula. The outbreak and end of the Korean War is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use – and – effect relation. However, to some extent, the Korean War is the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outbreak and end of the Korean War has in turn promo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Northeast Asia.

Key Words: the Korean War; two groups; Northeast Asia; pattern; confrontation

^① Edward S. Mason, et al.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94–195.